

讀懂中國

阅读历史

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

启蒙中国

张宝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

启蒙中国

张宝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 / 张宝明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161-5322-2

I. ①启… II. ①张…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56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云
特约编辑 陶璋
责任校对 张译
责任印制 李慕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136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89千字
定价 4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世纪回眸：知识分子的启蒙历程	1
一 启蒙的历史：20世纪前20年启蒙回眸与再现	1
二 历史的启蒙：20世纪后20年启蒙比照与反思	4

第一编 立人与启蒙

第一章 人的发现：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传统	15
一 人的发现：五四新文学史实给定的启蒙基调	15
二 人之打造：文学倾向与政治意识的较量	16
三 人学传统：五四文学探源的启蒙意义	19
第二章 人之导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与学生	24
一 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	24
二 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	26
三 走向：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	28
第三章 超人理念：知识分子在民主启蒙中的自尊与自卑	31
一 三反：一个超人时代的到来	32

二 超人的渺茫：个人主义的困境	40
三 人力车夫：来自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应	43
第四章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	50
一 Humanism：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50
二 立人之道：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颀颀	54
三 百年树人：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的紧张	58

第二编 文言与白话

第一章 民主意识与胡适“他们”、“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	65
一 “他们”与“我们”的话语尴尬	65
二 民主意识与精英意识的紧张	67
三 自立与立人的启蒙两难	73

第二章 “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78
一 文化社会学：《新青年》引发的“文白不争”	79
二 “文白之争”：在自谦与自负两种气质之间	82
三 残酷的断裂：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86

第三章 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90
一 通向大同的路径：世界语与乌托邦理想的升堂	90
二 “人造的理想”：世界语与现代性的吊诡	96

第四章 重建阶级秩序：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104
一 农民文艺与革命文学之争：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104
二 小资产阶级改造：文化领域统一战线的形成	111
三 文学大众化：阶级改造冲动下的语言乌托邦想象	117

第三编 思想与困窘

第一章	超越与回归：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	125
一	国粹情结：以心入世的道德理想·····	125
二	力不从心：心力超拔的道德阐释·····	129
三	古典人文性情：自我膨胀的精神胜利法·····	131
第二章	新文化元典与陈独秀领衔的内圣外王思维模式·····	136
一	超越与回归：新青年时代的思想症候·····	136
二	现代与传统：陈独秀领衔的启蒙潮流·····	139
三	求同与存异：同仁之间的思想互助·····	143
第三章	狱中自述与三位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	154
一	自传：同是天涯沦落人·····	154
二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156
三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162

第四编 话语与权力

第一章	唯新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话语规则的确立·····	167
一	唯新主义与五四文学的审择标准·····	167
二	启蒙心态与唯新主义的话语逻辑·····	171
三	审美价值与启蒙观念的颀颀对抗·····	174
第二章	思与言：中国近代思想文本的书写尴尬·····	179
一	启蒙与表达：近代中国思想书写中的文学修辞·····	179
二	文学与思想：不同知识领域话语规则的对抗·····	184
三	觉悟与启蒙：关于中国近代说服式启蒙的思考·····	187

第三章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话语的再诠释	193
一 启蒙与革命：两次逻辑命题的历史描述	193
二 弱势与强势：激进与保守的失衡	194
三 改良与革命：启蒙引导的两种现代路径	201
第四章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204
一 巴黎和会：在公理与强权之间	204
二 劳工神圣：在体力与脑力之间	206
三 人道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208
四 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210

第五编 自由与正义

第一章 从启蒙到革命：自由王国的道德引渡	215
一 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	215
二 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	218
三 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	220
四 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	223
第二章 自由与平等：我们离社会正义还有多远？	225
一 无法化约的命题：一次必要的历史考察	225
二 必要的思想辨析：自由与平等之间	227
三 可怕的直线：谁来对普适性与国情论的吊诡负责？	232
第三章 自由、平等、博爱命运的世纪考察	235
一 关键词：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235
二 严复与孙中山：思想家与实行家	236
三 胡适与陈独秀：渐进氏与激进族	238

四 顾准与姚文元：低调的经验与高调的理想·····	240
五 观念词：消融在在野与野下的意识中·····	243
第四章 儒家传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景	
——从中庸的视角出发·····	245
一 思想界的自由动向·····	245
二 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对接的可能性·····	246
三 打捞中庸：传统资源里的一枚人文古币·····	247
四 中庸之道的现代诠释·····	250
五 自由追求者的精神衔接·····	252
结语 一位启蒙后学的心路历程与启蒙言说·····	257
一 保守主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	259
二 激进与保守：在情感与理智之间·····	260
三 走向守成：反传统主义的终结·····	263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76

导论 世纪回眸：知识分子的启蒙历程

“启蒙中国”，这曾是近代以降一代代知识分子萦绕心头、矢志不移的中国梦。20世纪，启蒙浪潮曾经一浪高过一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浪漫激情渐渐隐去，“启蒙死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启蒙仍以各种移位变形的姿态或隐或显、或暗或明的形式演绎着、言说着。对于一个置身新世纪思想氛围下的知识分子，重新回眸反思20世纪启蒙的幽微曲折应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里，要给读者直接说明的是，给20世纪启蒙把脉，笔者的立意还在于观测并体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之崖上的攀缘、挣扎与颤抖，从而更深入地把握知识分子在关乎人类历史命运活动中的心灵脉动。启蒙，是为了呵护人类的发展，而人类的发展是一个现代性不断添加的渐进过程。今天，我们不需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够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外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以下文字，算是为这一工作所做的努力。

一 启蒙的历史：20世纪前20年启蒙回眸与再现

就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状况而言，真正形成一套自觉的思想资源系统的启蒙应该说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就个性解放的程度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算是一个高潮。审视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时段不难发现，自西方舶来的启蒙到中国后有着鲜明的地域化特点。这里，笔者更倾向于说这些特点是西方思想资源与固有文化传统相互激荡的结果，是一种自然的流布，而不是人为的架构。

回眸中国近现代启蒙，我们可以在20世纪前20年和后20年的两头分别找自然形态的历史和历史的人为建构。撇开所谓的解构式的后启蒙，启蒙和新

启蒙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的相似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惯性下的历史循环。在这个部分，笔者将租赁前20年几个举足轻重的思想者的启蒙路径而管中窥豹。

首先，回眸20世纪前20年的三个时段，笔者发现中国近代启蒙一开始就与文学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不解之缘。以百日维新的思想先驱梁启超为例，变法失败后便在《新小说》中激情洋溢而且调子高亢地武断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也许是传统的文化济世思维模式作祟，以文艺作为启蒙思想的利器在五四之前的启蒙先驱那里成为一种时尚。这也是中国近代启蒙难以形成纯粹的启蒙辩证法的原因之一。^②正是受这种具有时尚特点的导向的影响，所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投医从艺，如同今天学者弃文从经（济）一样，就是学习倾向经济的郁达夫也成了小说家。正是这些具有高尚动机的文艺种子选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添了激情、理想和高调的浪漫。这个时段的启蒙思想家多亲近法国作家卢梭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推崇卢梭，并以《文学革命论》推动思想启蒙的深入，表示“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无不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因为他们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陈独秀的同志李大钊这样述说文豪的能量：“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③其实，这里也透露出那一代启蒙学者为何那样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原委。戊戌变法的思想巨头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如是，鲁迅同样以听将令的方式了却着自己的心愿：“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④文学激情的介入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启蒙不可或缺的佐料。仿佛不加入这个佐料，枯燥、干涩的理性启蒙就难以下咽。激情的介入使得中国启蒙多了一份浮光掠影似的务虚。戊戌变法前夕发生的甲午海战将中国清王朝惨淡经营的海军打得一败涂地。连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之关系》，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难以产生欧式的启蒙思想家，更难有系统如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和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那样的《启蒙辩证法》。启蒙系统理论和建构框架之所以“难产”，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总是强调中国的近现代启蒙有“残缺性”，是“中国化”的理由。

③ 《李大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8页。

④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一介日本武夫都看出了大清国的症结：“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①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真像先哲想象得那么灵验吗？就舶来的启蒙思想资源而言，更何况除却卢梭还有更为厚重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书信大家呢！^②

如果说借助文学的煽情作用是近代启蒙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么启蒙先哲们不约而同地设计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更显启蒙本色。撇开国民性能不能改造不论，他们的改造还有着共同的逻辑构成：由立人而立国。梁启超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③陈独秀则反复强调：“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梁启超笔下的“新民”还是陈独秀口中念念有词的“新青年”，他们的政治素质对国体都举足轻重。两个时代的代言人分别陈述道：“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⑤带着所谓辛亥革命的教训，陈独秀也故作深沉起来：“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⑥在两代先驱看来（包括后来者），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实现必须让多数国民都觉悟起来、热心政治，至少不能让国民永远处于蒙昧的思想边缘：“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⑦他们欲将所立之人注入浓烈的政治强心剂。这预示着以政治热情取代个性独立的启蒙时代即将到来。将“改造国民性”和“唤起国民政治觉悟”死死纠缠在一起，我们不禁要问：与改造国民性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是人性改造，究竟启蒙畛域的“改造国民性”笼统提法能否化约式地予以肯定？

如果说与文学的情结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说与政治的关系稍嫌暧昧，

① 这是1895年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劝说被困的威海提督丁汝昌投降信中的一句话。中国文学性情和思维发达的特点不幸被一位日本武士言中了。原典出自王芸生主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册，第197—198页。该书于1931年由大公报出版。笔者资料来源转引自朱学勤2001年11月29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一文。

② [美]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70页。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之关系》，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⑤ 梁启超：《论小说与之关系》，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⑦ 同上书，第107页。

那么启蒙核心价值资源的正面流失则是启蒙先驱们不可饶恕的过失。梁启超的道德关怀足以用伦理的群将政治意义上的已打得落花流水。在其著名的启蒙力作《新民说》中，他对公德与私德的言说不遗余力。而且其道德注解仍然更偏向于利群。从他“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的告白中，我们已经不难窥见他那与传统伦理思想息息相关的新民理路。即使是他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说法也还是显露着传统基因克隆出的尾骨：“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①由己开始而终以身不由己的群结束这样一个模式，已经成为20世纪前期几次启蒙高潮的共同旋律。这里，笔者并不是说个人本位就是我们走向现代的圭臬，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摆不平正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显见硬伤。

当“伪共和”成为现实后，以《新青年》为阵营的一场文化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主将以“辅导青年修养”为鹄的，仍然导演着无声的内圣外王哑剧：“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惆怅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用道德伦理情结来解决而且是根本解决中国的痼疾，以为新与旧的颠覆便万事大吉，把一切的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押宝在伦理的骰子上。这个赌注的风险未免太大了。从五四前夕的“道德启蒙”到五四时期的“伦理革命”，再到五四后期如火如荼的“人道主义”，近现代启蒙先驱在潜意识中“躬行着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③，这里，笔者还是不禁要问：文化启蒙（着眼于伦理的）与政治革命关系在中国近现代的暧昧与传统的政教合一的伦理政治模式有没有版权纠纷？也许，这正是我们反思20世纪中国启蒙的必要性与现实性之所在。

二 历史的启蒙：20世纪后20年启蒙比照与反思

如果说上一部分是关于世纪启蒙的过去时的反观审视，那么应该说，这一部分则是关于世纪启蒙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梳理研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蔡少卿先生在述说其主编的一本社会史译著的序言中所说：我们再现过去的目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之关系》，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9页。

③ 鲁迅：《在酒楼上》，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的并不是“永远向着过去，为过去而再现过去，它的着眼点是现在和未来，通过再现过去，映照出我们生活的未来图景。马克思·韦伯说得好：‘未来如同历史！’”^①所谓现在时，这里指的是20世纪最后20年以及直到时下启蒙的思想状况；所谓历史的启蒙，意思是说现在时的启蒙主要基于对过去时启蒙的参照，而且还是一种传统路径的延续与承接。固然，它们属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思潮，但就其文章的套路来看，它们基本上还是对过去时的阐释、言说、归结、衍发和延伸。当然，80年代也有一些关于近代启蒙反思的观点，但总的来看，它们的声音尚微，不能与新启蒙对垒。到了90年代，关于启蒙的反思和解构才成为思想史上的一道景观。

80年代初期统领人文—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其实是借助70年代末思想解放、话语解冻的“东风”和“气候”来重申五四精神。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这样的字句：“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封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②接踵而来的“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辩很快成为舆论界的焦点。一时间，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声音纷纷涌现。这些有着鲜明上下互动并夹杂着人为政治色彩的启蒙话语之所以被视为五四文化启蒙主义的一脉相承，关键还在于它那打破禁区、祛除蒙昧的舆论是建立在“思想解放”的平台上的。文艺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无不蕴含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散发着“新启蒙”的气息。^③值得一提的还有80年代中期居高不下的文化热，其总体的观点还是不超过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三种观点：西化、结合、传统。^④但这次文化热所呈现的新启蒙主义的精神与五四“中西文化论争”的性质一以贯之，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学人表现出了真诚地继承五四、捍卫启蒙的精神。^⑤尽管当时在思想界十分活跃的李泽厚提出了“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导向，但他还

① [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③ 《新启蒙》杂志自1988年10月创刊，先后出版发行了4期，分别为《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王元化在第1期“编后”中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新启蒙》于1989年4月停刊。

④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陈飞等主编的《回读百年》第5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部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⑤ 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从海外学者对“五四”的评论说起》，《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8日。

是不能不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为启蒙辩护，认为五四提出的“启蒙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既然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就不能不继续思考。^①

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交锋，新启蒙主义一直占据着主流态势。从起初的风借火势或说火借风威的格局来看，上与下的互动构成了这个继承之外、区别于五四前后十年的时段特征。但后期随着二者张力的逐渐拉大，即使“示威”启蒙的思想威力再大，也还是拗不过“势威”的政治启蒙。于是我们见到的紧张、对峙、分化即将到来。需要补充的是，在90年代到来之前，尽管后启蒙的声音尚微，却已作为一股思想潜流涌动了。

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不可能轻松地结合，也不可能轻易地分离。笔者在批评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中有过详细的阐述。^②对于20世纪后20年代出现的这个互动，笔者不由得想起西方启蒙史学家的话：“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逻辑’。当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道路’时，历史成了激发乐观主义精神的工具，而不是解释过去。”^③80年代，是一个激情发挥而非理性反思的时代。当现代化的呼唤再度重演“改造国民性”、“激进反传统”的套路时，“轻率的悲观”很快就会为“盲目的乐观”所取代。^④他们原以为只要回归五四，只要按照五四的路径将反传统和批判“解放思想”以前的一切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绝对不是靠回归与批判所能解决的。从真理观到异化讨论的思想争鸣还掩藏着单向度的危机，通过回归来超越启蒙不是五四元典精神，更何况通过发掘马克思主义前期的思想成果——人道主义来支撑启蒙的体系建构又再度走进了五四曾经有过的误区。人道主义不是启蒙的唯一资源。80年代的知识分子欲以人道主义的讨论来还原启蒙精神，不但是一种超负荷的思想文化举措，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当我们在单向度地追随卢梭等这些带有激情和浪漫的思想家时，殊不知在真正的启蒙哲学家眼里，具有数学缜密和逻辑头脑的洛克、休谟、康德等才具有启蒙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32页。

②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③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④ [美]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页。

时代骄子意味。^①正如事实发展的那样，人道主义思想资源蕴藏的能量无以承受启蒙之重。1980年代后期，萨特、康德、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的后来居上也是有力的佐证。“历史惊人地相似。”不过相似之中也有不同的运作形式。五四初期的文化与政治在胡适的操纵下有意识地做了“不谈政治”的分离，但后来陈独秀耐不住寂寞，终于让《新青年》成为政治机关刊物，比较起来，这前后两个20年的情形只是一个先分后合与先合后分的不同罢了。^②当回归者沿着五四的路径一味激发时，他们也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敌对的政权需要敌对的过去”。历史学家刘易斯警告历史不能只有“回忆”、“恢复”，还要有“创造”^③。更何况领袖人物总是“强制性地解释五四，他们从过去只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抛弃了其余的一切”^④。启蒙思想史家的天真在这里暴露得一览无余。后启蒙时代的到来就是实践的结果。其中很多新启蒙主义者也是在这个刺激中有了角色摇摆或者转换。

在20世纪启蒙思想史上，一个值得予以特别说明的现象是：对五四前后时段20年启蒙的解构、批判、反思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当时只是一股民间学术界的潜流而已。但由于时代的气运关系，所以直到90年代伊始才不胫而走，甚至形成了一股时尚的思想潮流。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上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却是鲜见的。或许是80年代阳光灿烂、乐观情绪上涨的缘故，学术界对随西风而来的冰雹并未在意（它们没有对文化热降温起根本的冷却作用）。海外华裔学者率先把那些流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辐射到大陆学术界，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中一直被冠以“先驱”、“导师”，他们不是以“偏颇”（杜维明），便是“感情用事”（唐德刚）名之。以林毓生为核心的学者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将“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一下打入了冷宫。尤其是他把五四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从思想源头上对五四知识分子作了批判：“这种当代的文化暧昧性（或当代的文化危机）的直接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

① [英]I. 柏林：《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孙尚扬、杨深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0页。

②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6页。

③ [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④ 同上书，第310页。

有的特殊倾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听到了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1966—1976年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①言下之意，五四与“文化大革命”同根同宗，是一根藤蔓上的两颗苦瓜。知识分子的启蒙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进步，相反却带来无穷的困惑和遗憾。

也许是乐观的心情，抑或是“激情”的冲动，80年代的不置一词给人以五四式的自信，但理论的残酷总是比现实来得直接与深刻。于是90年代便有了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聚焦到人文精神讨论的转换。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居于启蒙中心地位的自尊，到80年代渐走边缘的尴尬和失落，伴随着自卑心理的“为五四一辩”、“重申五四精神”、“五四不容否定”等话语的频繁出现，一批批判、反驳、否定五四的立意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方阵。我们看到，无论是辩护还是问罪，都标志着中国启蒙已经走向深度梳理。20世纪末的启蒙文化背景，如同有人概括的那样，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激情受到一再的挫败以后，一方面难以很快地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②。多元化、个性化的局面的出现意味着真正启蒙纪元的发轫。90年代的人文精神无论是新（启蒙）还是后（启蒙），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无论是自居中心还是甘居边缘，它们都在一个意义上延伸并守护着一个独立的心灵家园。应该说，撇开歧义和争论，这才是一个启蒙成熟的时代。它已经超越了五四前后的10年，又在世纪末前10年的平台上寻找崭新的平台。《公共论丛》、《学人》、《原道》等同仁刊物的相继问世在世纪末点亮了启蒙之光。

1993年，《东方》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和陈平原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在笔者看来，这两篇文章虽然算不上是二陈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自选集里也不一定收录，

①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但它们却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心态晴雨表，也是中国启蒙走向深入的旁白。至少，笔者读出了思想启蒙学者的难言之隐。其中“退而结网”（响应余英时）、“学术向内转”、“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等再度衔接了五四的胡适、周作人等学者“整理国故”、象牙之塔的启蒙路径。^①尤其是陈平原的一句总结更是可见一斑：“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隐含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上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②由乐观走向深沉，由激情走向理性，由单向度走向多元化，20世纪末期的启蒙至少多了一种不以知识领袖自大的民间或说边缘姿态。

思想解放能把羞涩的道德面纱撕破，但解放思想却并不意味着断裂或回归，我们不能把王朔们的到来简单归结于深沉、拒绝反思。那些曾经走在时代最前列自尊自豪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失去了昨日作为时代领袖的发言权，但在自己固有的启蒙资源之外找到了可以令自我紧张的另一种启蒙或另几种启蒙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启蒙则是一个多向度的执着；在守成并呵护着五四以来启蒙精神（新启蒙）的阵营外，还有一个非常深沉的方阵在深沉反思的平台上为五四启蒙精神“补台”（后启蒙）。这一正一负的互补为建构中国未来的启蒙打造了坚实的底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学术界目前一边倒式地对后启蒙以及后学的一味指责和批评多少有些杞人忧天的味道。当笔者不幸被列为后启蒙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时。^③我除了回应“不是我不小心，不是存心故意”外，我还想对我并不谙熟，但却为学界一再引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的话作另类理解：“推动自由主义政治100年的启蒙运动也是如此。它已经过时了。衡量一下启蒙运动思想强调的教育在最先进的社会里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状况。组成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在19世纪的继承人认为，普及教育可以加强公民的自由、消灭政治上的宗派主义、阻止战争。今天没有人指望到处都名声扫地的教育会教

① 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创刊号），1993年第1期。

②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第1期。

③ 张光芒、张宝明：《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